

香港亞太研究所

從世界秩序伸展看 珠江口超巨都會崛起

楊汝萬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 Yeung Yue-man, PhD(*Chic.*),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ssociate Director : Lau Siu-kai, PhD(*Minn.*), Professor of Sociology

HK\$15.00
ISBN 962-441-090-9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從世界秩序伸展看 珠江口超巨都會崛起

楊汝萬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作者簡介

楊汝萬教授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地理學系講座教授及逸夫書院院長。

鳴謝

此文在九八年十月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香港對二十一世紀中國人之意義：人文與社會的觀察》學術研討會宣讀，其後補添數據資料和稍作更改。主辦單位同意此文在這裏發表，作者表示謝意。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鄧佩儀為本文資料搜集付出努力，九廣鐵路公司提供表二，在此同時言謝。

© 楊汝萬 1999

ISBN 962-441-090-9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從世界秩序伸展看 珠江口超巨都會崛起

前言

自八十年代初葉始，經濟全球化已加快和廣泛地滲透世界每一角落，產生前所未見的經濟繁榮，明顯地改變了當前人類的生產、工作以至生活的方式。地區與城市的相互關係、空間的作用及國家的定位，都需要新思維和新方法去重整。人類已進入了新的資訊時代，其中一個特徵是城市功能的強化，而另一個必然的狀況則是地區、國家和城市之間的發展差距逐漸地拉大。換言之，全球化固然有令人鼓舞的地方，但當它使人們生活改善、積聚財富和享受現代化所帶來的種種驚喜的同時，卻有不少的人因其國家、城市發展未能追得上資訊時代的需求，而未能享受到全球化所帶來的新機遇和新發展。¹

經濟全球化不是一個新現象，它在過去十多年迅速發展，主要有四個原因。² 首先，八十年代初，全球原產品和石油價格急劇下滑，使非洲、拉丁美洲和東南亞傳統上靠出口原產品賺取國家收入的國家，頓陷困境。原產品亦受科研突破引致減少用料而漸失去了以往的重要性，製造業的取向更

受其他因素所支配。第二，取代原產品而足以主導製造業的選點，是資金的流動。尤其是外來跨國資金，對工業製造的發展，有莫大的影響。這是國家、城市之間相互競爭的對象，成敗可直接左右它們的盛衰。第三，整個全球化過程，建基於新的國際分工理念，國家、城市之間的實力是在它們的比較優勢中反映出來。在世界的自由市場內，競爭大體可說是公開和公平的，只要具備優良、適當的生產元素，投資者便絡繹於途。最後，資訊時代的誕生，是受到一連串科技創新，如電腦、光纖、機器人、生物工程、資訊工程等突飛猛進的成就而催生的。它們的來臨大大改變了生意來往的方式，也帶來了生產選點的多元化和新的生活習慣。在以上所述的大趨勢影響下，跨國性的資金流、貨流、信息流和人流，均大幅遞升。一個無疆界的經濟時代，儼然已經來臨，對現在和下一世紀的發展，影響既巨大且深遠。

中國改革開放就是在這個劃時代轉變的環境下展開的。七八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定下了開放政策的大方針，八十年代剛好是起步，與全球化的加速發展正相巧遇，對中國的發展異常有利。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點，廣東、福建省內的四個特區被選擇的原因，正是它們毗鄰香港、澳門及台灣，後者對它們的發展有必要的先導和扶持作用。

誠然，在中央政策方針定下不久，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很快便建立了互利互惠的經濟關係。其後，發展關係伸延到福建。八七年台灣放寬民眾往大陸旅遊探親，稍後更准許台商間接在大陸投資，整個廣東、福建、香港及台灣地區迅速融合互結，形成所謂南中國「成長三角區」（growth triangle），孕育了一種新的跨地區經濟合作模式，對亞太區經濟發展有正面的示範作用。

南中國「成長三角區」與世界城市

南中國「成長三角區」的形成，是全球化下區域合作的體現。一方面，香港、台灣經過數十年蓬勃的經濟增長，累積了大量資金，也吸收、拓展了大量的生產經驗、管理技術和市場網絡，但它們同時都為本地高工資、昂貴地價及缺乏土地而苦惱。更有甚者，新台幣於八六、八七年大幅升值，八五年至八七年間，台灣已累積了 450 億美元的外匯盈餘，向外投資的壓力日益強大。此外，台灣民眾對環境保護的意識日漸高漲，政府對污染工業的管制明顯地比以前嚴謹，加速了工業外遷的意向。相反，廣東與福建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廣闊且正待開發的土地和靜極思動的進取心態。他們欠缺的是資金、技術、管理和市場，這剛好是香港和台灣的強項。這天衣無縫的配合，加上地緣、血緣、文化相通，天時、地利、人和俱備，合作一蹴即合，很快便創造出驕人的成績。

在這合作關係中，香港與廣東、福建的經濟互動較早建立；事實上，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的相互依靠發展的趨向，早在八十年代初已見端倪。香港廠家大規模地把廠房向珠江三角洲北遷，但接單、設計、管理和外銷均堅留在香港，於是「前店後廠」的模式如此便實現了。據非官方的統計，廣東現有三百萬製造業工人都是香港資金投資僱用的，其中涉及一萬項合資項目和二萬座工廠。³ 從統計數字看，香港自八十年代中起，與中國的貿易和轉口貿易，升幅異常急速，為兩地帶來很可觀的經濟收益。在香港經濟增長額中，內地因素佔了四成以上，其中進口貿易額中與內地有關的貿易額佔 67%，在交通運輸業中往來內地的貨物轉運佔 70% 以上，在旅遊業和金融業中內地也佔較大的比重。⁴ 單從廣東與香港的

進出口數量，兩地的互動互靠情況十分明顯。從表一可看出在九十年代初期，廣東出口至香港的比重達總出口的 85% 左右，而香港進口亦以廣東（1994, 24.4%）和中國其他地區（1994, 31%）佔一大部份。反過來，香港的進口，近 80% 來自廣東，而香港出口，較小部份是輸往廣東（1994, 17%），比較大部份是輸往中國其他地區（1994, 32.8%）。在這個如魚得水的合作環境下，香港和廣東的人流、貨流與信息流均持續大幅飆升，從香港羅湖過境的旅客，從八零年的六百萬跳升到九二年的三千五百萬，單過境人次於九八年節日已達十二萬有奇。香港與廣東的人流，大約七成是經深圳過境，餘下經珠江三角洲其他的口岸往來。⁵自九零年以來，經羅湖口岸來往香港深圳之間的旅客，與年俱增。在九零年至九七年間，出入境人數各已倍增至二千七百萬有奇。到九七年，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的平均出入境人數已達十六萬有奇（見表二）。

香港在整個南中國區域經濟合作框架中，擔當核心角色。它和廣東、珠江三角洲的關係固然密切，台灣因礙於未能實踐「三通」的制肘，資金、人流及貨運均須經香港或其他地區（主要是香港），香港因此扮演了重要的中介橋樑角色。從全球經濟角度著眼，香港是亞太區內一個舉足輕重的世界城市。世界城市的價值，不在於它的人口多少，而是從它的功能而產生。有關的功能可以源於經濟、交通、金融、文化以至宗教諸方面，對全球運作有難以取代的貢獻。所以，儘管就中國而言，北京、上海人口均較香港眾多，但真正稱得上世界城市的，中國僅有香港。值得注意的是，在亞太區內，世界城市快速冒起，足以維持亞太作為全球經濟增長超前和最迅速的地區。在新的世界經濟秩序和資訊時代中，城市的重要性與日俱增。⁶

表一：香港和廣東進出口情況，1992-1994

A. 出口

單位：億美元

	廣東出口			香港進口		
	出口 香港	出口 總額	比例 (%)	進口 總額	廣東所佔 比例 (%)	中國其他 地區所佔 比例 (%)
1992	155.58	184.40	84.4	1,237.07	12.6	37.1
1993	229.51	270.27	84.9	1,386.50	16.6	37.5
1994	391.59	469.93	83.3	1,603.47	24.4	31.0

B. 進口

單位：億美元

	廣東進口			香港出口		
	進口 香港	進口 總額	比例 (%)	出口 總額	廣東所佔 比例 (%)	中國其他 地區所佔 比例 (%)
1992	82.68	111.79	74.0	1,194.88	6.9	29.6
1993	155.40	198.98	78.1	1,352.44	11.5	32.3
1994	254.40	342.70	74.2	1,500.02	17.0	32.8

資料來源：Tsang, S. K. and Y. S. Cheng, "The Economic Link-up of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Structural and Developmental Problems." Hong Kong: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 54, Centre for Asian Pacific Studies, Lingnan College, 1997, Table 3.

表二 A：經由羅湖來往港深之間搭客人次，1990-1997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平日	入境 8622428	9865407	11490658	12389414	12807954	13471003	14891791	17103802
	出境 8122003	9440986	11044649	11997030	12525474	13387097	14922526	17156434
星期六	入境 1733255	1938744	2087113	2293800	2483650	2603374	2880276	3463486
	出境 2345730	2662683	2830902	3060350	3425018	3695999	4234094	5141021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入境 3348817	3695427	4041604	4030149	4688708	5094243	5682920	7328205
	出境 2319626	2565853	2842031	2804134	3331564	3541628	3797000	4854065
總人次	入境 13704500	15499578	17619375	18713363	19980312	21168620	23454987	27895493
	出境 12787359	14669522	16717582	17861514	19282056	20624724	22953620	27151520

表二 B：經由羅湖來往港深之間搭客人次（每日平均），1990-1997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平日	入境 34768	39780	45780	49558	51645	54538	59567	69811
	出境 32750	38068	44003	47988	50506	54199	59690	70026
星期六	入境 36109	40391	45372	49865	51743	54237	60006	72156
	出境 48869	55473	61541	66529	71355	77000	88210	107105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入境 48534	53557	58574	58408	67952	72775	82361	101781
	出境 33618	37186	41189	40640	48284	50595	55029	67418
每日平均	入境 37547	42465	48140	51269	54741	57996	63910	76426
	出境 35034	40190	45676	48936	52828	56506	62544	74388

資料來源：九廣鐵路公司東鐵部。

香港是亞太地區一個多功能、高度國際化的重要城市。它的成功要素廣為人識，不贅。值得一述的是，它成功的一部份是屢次把握時機，化險為夷。其中數次的經濟轉型尤其關鍵。第一次發生於五十年代初，韓戰爆發後大陸受禁運封鎖，香港利用內地擁入的新移民，包括來自上海的資本家及他們帶來的資金和技術，使香港順利從細小的轉口港轉化為勞工密集的工業外向城市。第二次的轉型巧與中國改革開放同時發生。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由製造業中心蛻變為服務中心，以金融為核心，其中過程上文已述。其實，從八一年至九五年間，香港服務輸出的總值每年平均增長16.5%，高於出口及生產總值的增長。九四年，服務輸出總值首次超過出口值，佔香港生產總值的24%。⁷九七年底爆發的亞洲金融風暴，很可能導致香港進入第三次經濟轉型，有學者並認為香港有條件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國際金融服務中心，與紐約、倫敦及東京並駕齊驅。⁸

無論如何，香港目前在貿易、經濟、金融、航運等方面已是經濟巨擘，在區內和世界飲譽極濃。香港現在是世界第八大的貿易體系，全球最繁忙的集裝箱港口，第五大的金融中心 and 第五大的外匯市場，它的股票市場在亞太地區排名第二，僅次於東京，在未搬遷之時啟德機場是世界第四繁忙的空港（以國際乘客算）。

穗、港、澳超巨都會帶的崛起

超越國界的區域經濟合作，已成為世界經濟實現一體化的重要內容，南中國的模式被公認成功，但亞太區和歐洲均有不同的組合嘗試發展合作。⁹隨著九七回歸順利完成，香港已轉變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它與珠江三角洲的關係更趨

緊密。十年前筆者已預見香港、廣州與澳門正邁向都市連綿帶方向發展。¹⁰現際回歸一年後和廿一世紀的前夕，正是適當的時候作出回顧與前瞻。

珠江三角洲是城市密集區或城市連綿區，是中國七大城市群之一，亦是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對區內的經濟發展和港澳的經濟聯繫與合作，均發揮重大作用。¹¹所以，廣州、香港與澳門的關係被通稱為「金三角」。在過去的十數年間，此區內的經濟、基礎建設、文化活動等，合作頻密且速度持續上升，對地區的連接和整合，具有積極的意義。澳門於九九年回歸後，對三地的結合更將有進一步的強化作用。至九六年香港回歸的前夕，廣州、深圳、香港與澳門的基本經濟背景資料已揭示前兩者的經濟增長異常迅速，平均增長達雙位數字，他們的個人國民生產總值已和香港拉近，只是數倍之分（見表三）。

表三：廣州、深圳、香港及澳門的基本經濟情況，1996

	面積 (平方公里)	總人口 (百萬人)	人均國民生產 總值(美元)	國民生產總值 增長率(%)
廣州 ¹	7,434	6.56	4,085	11.0
深圳 ¹	328	1.03	4,973	12.6
香港 ²	1,095	6.22	22,990 ^a	4.7 ^a
澳門 ³	21	0.42	16,184 ^b	12.3 ^b

註：a. 1995 數據。

b. 1994 數據。

資料來源：1. 《廣東統計年鑒 1997》。

2.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3. Macau Official Homepage (<http://www.macao.gov.mo>).

香港的經濟作用，對廣東以至整個中國的重要性，七八年後已表現無遺。香港是中國最首要的外來投資者，佔外來投資的六成。九三年末，全國 63.8%（167,500 的 106,914）的外來投資企業是來自香港。¹² 因地利人和的關係，廣東於八五年至九二年間佔了香港投資於中國資金的 42%。香港的資金同樣亦佔了廣東於八五至九二年間外來投資的 84%。¹³ 影響所及，廣東在七八年至九六年間以每年 14% 高速經濟增長，當中香港的因素可謂功不可沒。¹⁴ 一如中國開放政策的決策者所料，香港對深圳的經濟起飛和扶持，其決定性幾乎是全面的，其他勢力絕對難以相提並論。八六年至九四年間，香港投資於深圳佔了外來投資 14.5 億美元的 78.1%，¹⁵ 香港和廣東的經濟依賴性亦因活動的深化和廣化而不斷增強。九二年至九四年間，廣東的進出口貿易直接或間接經香港的高達 70-85%。相反，香港的本身出口至中國大陸，75% 是為加工工序而出現的。¹⁶ 兩地的經濟命脈可以說互通有無、漸成一體。此外，八零年至九二年間，中國經香港轉口運輸海外的貨品年增 26%，使香港戰後式微的轉口業強力復興，其重要性已遠超本身進口，這同時有助香港成為一個高增值的工業轉口重鎮。¹⁷

在香港經濟轉型與高速發展的同時，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同樣出現急劇的轉化和驚人的進步。廣州計劃到本世紀末基本形成「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主骨架」。「九五」計劃確定了到本世紀末的奮鬥目標。「這是理想，這是意志，這是力量，這是有根據設計的科學藍圖，是廣州發展與建設史上最精彩的樂章。」¹⁸ 簡單的說，廣州在推進兩個根本性轉變中實現經濟增長。第一，全面推進科技工作，務求提高市民的科技意識和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第二，在廣州市經濟增長依

靠科技進步的戰略藍圖中，教育佔有顯著的地位，人力培訓是發展內涵重要的一部份。此外，在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過程中，廣州十分關注經濟增長與資源可持續發展的關係。為了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及強化城市形象，政府投資重點有三：基礎產業、支柱產業和高技術產業。最後，廣州城鄉一體化進展迅速，是計劃與自發相互影響、相互激盪的更全面的現代化的體現。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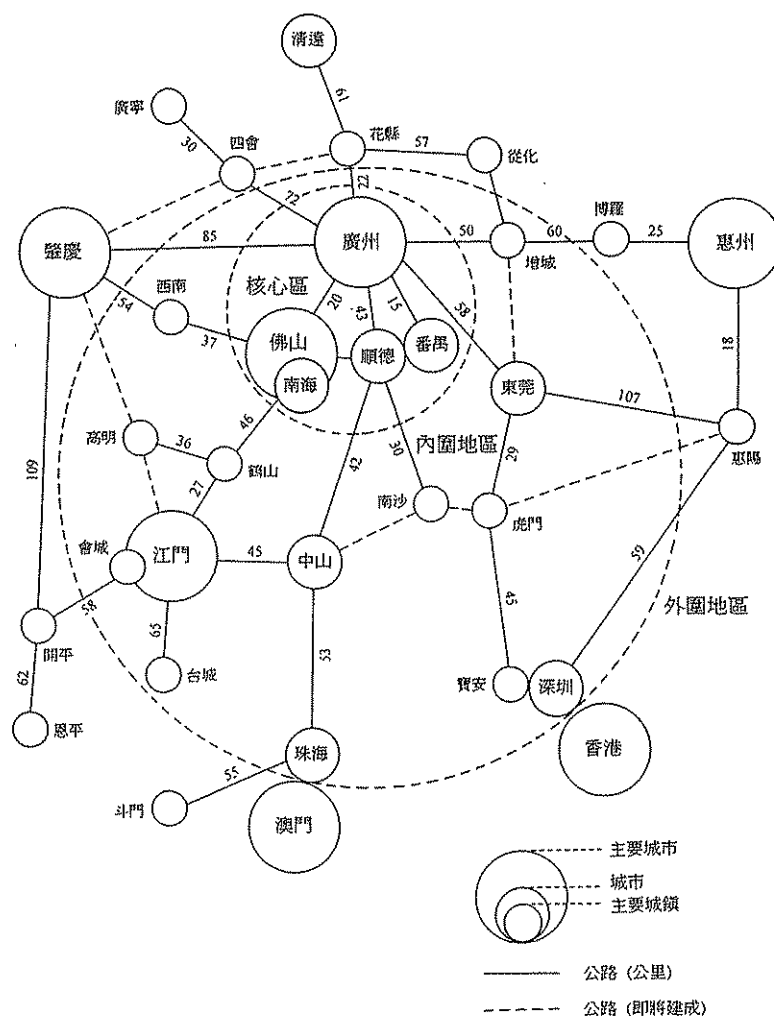
廣州固然是省會，歷史悠久，人口集中，傳統上在經濟、政治與文化都是全省最重要的城市。九六年末，城市人口已達 403 萬，其中四分之一是暫住人口。但分佈在珠江三角洲上的是星羅棋布的中小城市，他們在改革開放時期中，經濟增長速度比廣州還要快，發展以靈活化、多元化見稱。其中順德、南海，中山及東莞在七八年以來，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超越 20%，被稱為「廣東四虎」。²⁰ 它們代表開放政策在珠江三角洲最顯赫的成就，同獲益於香港的投資和管理技術轉移，但發展方向和重點則各有千秋。²¹ 例如，東莞經濟從農業轉向工業，而且於八五年提升為市後發展明顯加速，到九零年從農村轉化到城市已成為政策的目標。東莞受香港的影響尤為突出，以服裝、玩具和塑膠工業較為重要。飛快發展和寬鬆的規劃體系的結果是土地用途急劇轉變。八八年至九三年間，東莞轉變用途的土地高佔農地四分之一。其實，整個珠江三角洲農地消失的速度使人驚訝，從八零年至九一年，農地急降了 14%。²² 佔用農地大部份是城市發展為主導，集中在城市本身及香港至廣州沿火車軌和高速公路一帶，從衛星圖象更清晰易見。²³ 位於三角洲核心的順德，雖然它的高度商業化農業在開放後仍然暢旺，但它的工業發展卻因比較少依靠香港而發展出一系列的高質素電器產品，

如風扇、冰箱、電飯煲、洗衣機和冷氣機，在國內和國外頗有名氣。珠江三角洲內的大小城市分佈可見於圖一，密度之高與連貫的必然性，從線條和距離可窺其一二。

對於計劃未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發展戰略，廣東當局思路是包括與香港組合而成為亞太地區最重要城市集聚之一。主要的方向是「大力推動規模等級不同、職能分工和服務地域不同的各城市之間加強聯繫，實現功能互補，盡可能避免或消除城市間……的惡性競爭，使本區城市群成為分工協作，聯合發展的整體。」²⁴ 在城市空間發展體系上，集中於兩個發展主軸，即重點發展核心城市（廣州）與副核心（深圳、珠海）間形成發展地帶（見圖二）。形成以廣州為軸，東南西南朝向往香港和澳門的兩組城市群，城市之間差不多已連接起來。除了兩條發展主軸外，還有七條拓展軸，臚列如下（見圖三）：²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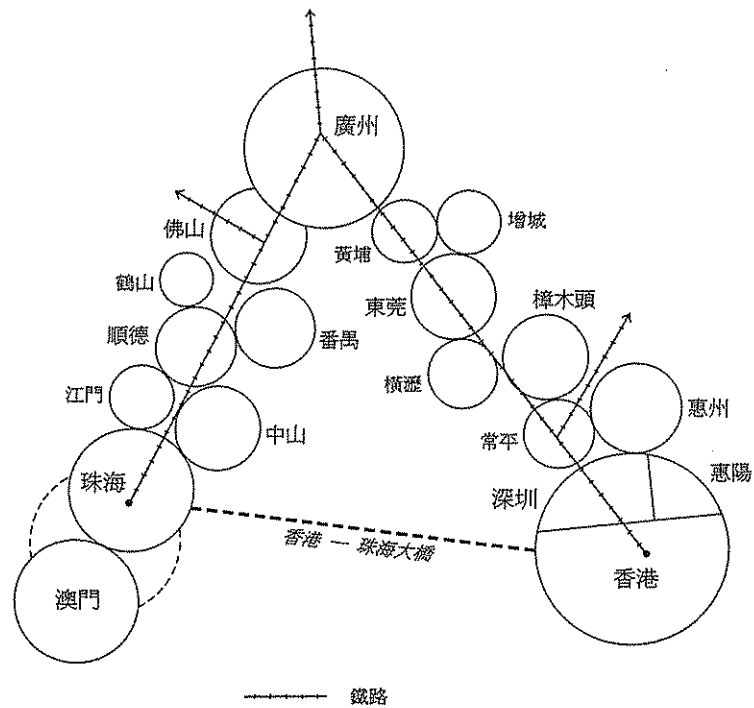
- （一）廣州 — 肇慶 — 西江拓展軸，區內沿線城市：三水、四會、高要、肇慶。
- （二）廣州 — 清遠 — 韶關 — 湖南拓展軸，區內沿線城市：花都。
- （三）廣州 — 佛山 — 湛江 — 廣西拓展軸，區內沿線城市：南海、佛山、鶴山、開平、恩平。
- （四）廣州 — 惠州 — 汕頭 — 福建拓展軸，區內沿線城市：增城、博羅、惠州、惠東。
- （五）（港澳）珠海 — 湛江 — 廣西拓展軸，區內沿線城市：珠海、新會、台山。中心城市：珠海。（再可分枝）
- （六）（香港）深圳 — 惠州 — 河源拓展軸，區內沿線城市：惠州。

圖一：珠江三角洲城市地區的主要軸心與聯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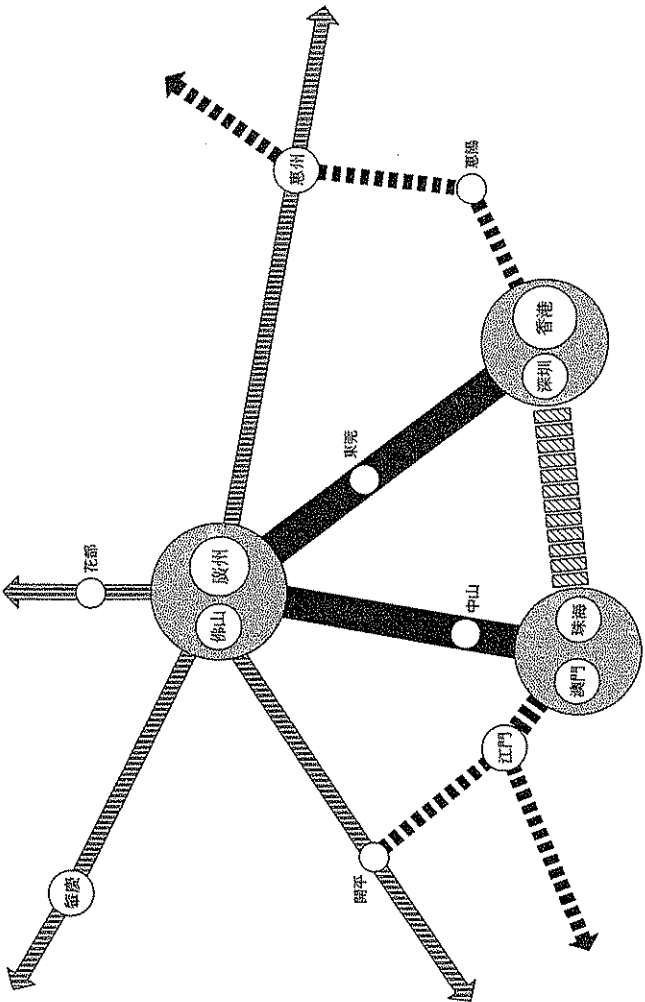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Zheng Tianxiang,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s among Hong Kong, Macau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a," *Asian Geographer*, Vol. 8, No. 2(1989), p. 99.

圖二：珠江三角洲城市帶的理念架構



資料來源：Finance Weekly, 16 May 1993, p. 6.

圖三：珠江三角洲節點軸線發展體系



資料來源：《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城市群規劃》（看註 24）。

人口規模到 2000 年，珠江三角洲戶籍總人口將為 2,380 萬，2010 年將達 2,844 萬。其中暫住人口預測為 2000 年的 392 萬，2010 年為 489 萬。城市化水平從九三年的 42.7% 將升至 2000 年的 50%，到 2010 年可達 75%。²⁶

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一個特徵是它的動力來自區內和區外三個方面：中央政府、當地政府和世界性或跨國資金。因此，三角洲的經濟、社會和生活變遷可說是世界秩序伸展的體現。在區內主要是經過兩種相連和同時發生的過程，即是人口的重新分佈和土地利用的轉化。一個以區域為本位的城市化所導致的自然結果，是在農村地帶上出現工、農業用地犬牙交錯，城鄉的分野也因此漸趨交織融合、模糊不清。²⁷

從上述的城市體系思維和近年經濟進步與環境惡化來看，以廣州、香港和澳門三角鼎立的局面已經形成。在全球化持續發展下，此地區在二、三十年後，很可能成為一個更昌盛和先進的城市連綿區，容納三、四千萬人口。為促進達到發展目標，大量投資基本建設似乎無可避免。從圖二可看出，珠江口香港與澳門、珠海尚未有陸上連接，伶仃洋大橋的建造一定可以大大提高三角洲東西翼的交往。九七年虎門大橋的通車已對較北從虎門到南沙的東西連接有很大的加強作用。其他的設施，如鐵路、高速公路、飛機場和港口等，近年均有很巨大的進展，但合作和協調方面仍有待改善。

無論如何，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整合，與日俱增。據非官方統計，香港現有十萬人已在廣東定居。²⁸ 為了工作上的需要，每天香港人經不同口岸往返廣東的有五萬人次，大部份是與工廠管理工作有關。²⁹ 此外，港幣在廣東廣泛通用，有學者估算在南中國流通的港幣從八零年的 7 億猛升到九二年的 150 億。換言之，香港發行的幣值，有約三成在南中國流通。³⁰

倘若我們設想珠江口超巨都會是一個新城市名叫珠江城，香港一位銀行家有這樣的描述：

想像這是 2006 年。珠江城是世界上一個最巨大和富裕的城市帶。包括郊區在內，從北到南，它張延 160 公里並有四千萬人口。香港每年人均收入達四萬美元而中山周邊地區也有一萬美元。珠江城的基本設施受到全球的羨慕。捷運鐵路系統和公路、橋樑和隧道的網絡使居民可從香港的赤柱於九十分鐘內抵廣州市中心。³¹

這個是否不切實際的幻想，還是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的結合已使這景象於數年內便可實現，很快便有答案。就算短期內情況未能如願，香港與區內的一體化仍是世界新秩序引領下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必須走的道路。

結論

此文嘗試按近年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和亞太區內的跨地區經濟的合作情況，集中討論珠江口雛形已露的城市連綿帶。因香港回歸只一年，而澳門於明年才正式回歸，此超巨都會明顯還在蘊釀及發展之中。以廣州、香港和澳門為主位的城市群，合作和協調發展可減少重複投資和增加效益。目前三地均為它們廿一世紀的藍圖而努力，有關當局亦察覺合作的必要性，惟跨地域的組織和權力機構，尚未建立。各種的交流和聯繫正需加快和加深，務求團結產生新力量，使區內發展更上一層樓，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更加進步。

合作發展有著它的阻力。首先，香港和澳門經過長時期的殖民地統治，已習慣他們的管治方式和意識形態，與三角

洲其他政府合作需要放下包袱，相互適應；相反，三角洲的政府也需學習香港和澳門成功的地方。其次，香港與周邊地方的發展水平和人均收入分別很大，九六年香港的人年均收入是廣州、深圳的大約四、五倍。雖然如此，後者和其他三角洲城市已迅速地急起直追。第三，港澳與三角洲的城市互補與競爭兼而有之，怎樣協調以收相得益彰之效，是未來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從全球化的角度著眼，香港確實可以繼續發揮它的作用。近年發展已揭示，香港企業家放眼世界，除了中國投資外，香港投資已遍及全球。例如，李嘉誠最近在香港電視專訪節目中透露，他旗下公司在港口業服務投資達二十四個國家之多。無怪乎香港對外投資資金於九六年已達全球首四位。香港企業家累積了數十年國際投資經驗，加上豐裕的資金、全球人際網絡和最新科技，是新世界經濟秩序重要的參與者。香港更可吸納中國大陸的精英份子，以確保最佳的人才投入於競爭日趨劇烈的跨國經濟運作之中。香港還有十分有利的地理條件，只要珠江三角洲其他城市與香港配合，超巨都會的崛起和對亞太區內以至世界產生更為重要的影響，應指日可待。

註釋

1. 參閱 Yue-man Yeung,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Richard Stren and Judith K. Bell (eds.), *Perspectives on the City*. Toronto: Centre for Urban and Community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1995, pp. 189-226.

2. 參閱 Yue-man Yeung, "An Asian Perspective on the Global City,"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No. 147 (March 1996), pp. 25-31 和 Fu-chen Lo and Yue-man Yeung (eds.), *Emerging World Cities in Pacific Asia*.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南中國和亞太地區內其他「成長三角區」的比較，可參閱 Yue-man Yeung, "Growth Triangles in Pacific As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Lew Seok-jin (ed.), *Tuman River Area Development Projec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Seoul: The Sejong Institute, 1995, pp. 57-80.
4. 傅崇蘭編，《港澳與其周邊地區合作關係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頁 39。
5. Anthony Gar-on Yeh, "Planning of Hong Kong's Border Area," in Anthony Gar-on Yeh (ed.), *Planning Hong Kong for the 21st Century*. Hong Kong: Centre of Urban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6, pp. 308-28.
6. Fu-chen Lo and Yue-man Yeung (eds.),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of Large Cities*.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7. 傅崇蘭編，《港澳與其周邊地區》（看註 4），頁 154。
8. 鍾蘊晴，「香港面臨第三次經濟轉型」，《大公報》，1998 年 9 月 16 日。
9. 參閱高連福、周小岳，《走向 21 世紀的亞太經濟格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5，第四章；T. Stryjakiewicz and Chung-tong Wu (eds.), "Special Issue on

- Changing Border Regions in Europe and Asia,” *Geojournal*, Vol. 40, No. 3(1998), pp. 189-201.
10. 朱劍如、楊汝萬、林建枝，“穗港都會帶的地理基礎和展望”，載 Leung Chi-keung, Jim Chi-yung and Zuo Dakang (eds.),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9, pp. 375-84.
 11. 傅崇蘭編，《港澳與其周邊地區》（看註4），頁194。
 12. S. K. Tsang and Y. S. Cheng, “The Economic Link-up of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Structural and Developmental Problems.” Hong Kong: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54, Centre for Asian Pacific Studies, Lingnan College, 1997, p. 5.
 13. Y. Y. Kueh, “The Fifth Dragon: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Take-off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Hong Kong: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5, Centre for Asian Pacific Studies, Lingnan College, 1994, p. 28.
 14. B. Gilley, “Loosening Bond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3 July 1997, pp. 54-60.
 15. W. Wu, “Proximity and Complementarity in Hong Kong-Shenzhen Industrialization,” *Asian Survey*, Vol. 37, No. 8 (1997), pp. 771-93.
 16. Tsang and Cheng, “The Economic Link-up” (see Note 12), p. 5.
 17. Wu, “Proximity and Complementarity” (see Note 15), p. 783.
 18. 傅崇蘭編，《港澳與其周邊地區》（看註4），頁42。
 19. 傅崇蘭編，《港澳與其周邊地區》（看註4），頁41-56。
 20. Y. M. Yeung and David K. Y. Chu (eds.), *Guangdong: Survey of a Province Undergoing Rapid Chang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8.
 21. 過去二十年珠江三角洲農村的變化很大，有地區性的分別，可分為數個模式。參閱 Graham E. Johnson, “Processes of Chang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How Many Models of Development?” Vancouver: Unpublished Pape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94.
 22. Anthony Gar-on Yeh and Xia Li, “An Integrated Remote Sensing and GIS Approach in th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f Rapid Urban Growth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 Vol. 2, No. 2(1997), pp. 193-210.
 23. Anthony Gar-on Yeh, “Economic Reform and Land Use Changes in Donggua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K. N. Au and M. Lulla (eds.), *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as Seen from Space*. Hong Kong: Geocarto International, 1996, pp. 101-10.
 24. 廣東省建設委員會、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城市群規劃組編，《珠江三角洲經濟區城市群規劃》。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6，頁26。
 25. 同上，頁37。
 26. 同上，頁28-30。
 27. George C. S. Lin, *Red Capitalism in South China: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Vancouver: UBC Press, 1997.

28. Gilley, "Loosening Bonds" (see Note 14), p. 60.
29. R. Mondejar,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A Case of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London: Weltforum Verlag, 1994, Table 4.
30. Y. P. Ho and Y. Y. Kueh, "Whither Hong Kong in an Open-door, Reforming Chinese Economy?" *Pacific Review*, Vol. 6, No. 4(1993), pp. 333-51.
31. 這是翻譯，原文可見 D. Li, "Pearl City Here We Com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6 July 1996.

從世界秩序伸展看珠江口超巨都會崛起

摘要

近年全球化對世界經濟影響既快且深，產生一股強大的動力，把人類發展推上新高峰，但同時亦加深不平衡的現象。此文闡述全球化產生的由來。

全球化過程在亞太區衍生了區域間經濟合作的實現，命名「成長三角區」。南中國經濟合作區包括香港、台灣、廣東與福建是區內第一個合作實例，亦是發展最迅速和最成功的模式。在合作發展中，香港的作用特別明顯。

在南中國成長三角區內，於珠江河口正蘊釀一以廣州、香港和澳門為核心的超巨都會。文中對當地城市群發展的近況和前景作出分析和預測。他們之間尚須更緊密合作才達到共同的目標。

The Emergence of Pearl River Delta's Mega Urban-region in a Globalizing Environment

Yue-man Yeu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deeply affecting the global economy. It has brought human development to a new peak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deepened inequality among regions and countries. This paper briefly explores the reasons behind globalization.

With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globalization has given rise to sub-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ptly termed "growth triangle." The Southern China growth triangle, inclusive of Hong Kong, Taiwan, Guangdong and Fujian, is the first such sub-regional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experiment. It has achieved rapid and widely laudable success. In this sub-region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has played a catalytic and important role.

Within the Southern China growth triangle, a gigantic urban agglomeration defined by Guangzhou, Hong Kong and Macau is emerging. This paper analyses recent development in this urban region and forecasts what the future might have in store. In order for the urban region to achieve higher levels of success,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governments concerned seek closer cooperation.